



云南马铃薯的本土化与主粮化嬗变

曹茂 黄忻瑶

马铃薯,云南人俗称“洋芋”,菜粮兼用型农作物,是我国第四大粮食作物。云南高原立体气候适宜马铃薯四季种植,产量常年位居全国前列。马铃薯自南美洲传入云南后,在百年社会变迁中完成本土化转型,从边缘蔬菜跃升为核心主粮,书写了独特的作物演进史。



本报记者 陈飞摄

异域嘉种,滇山试种:马铃薯在云南的早期拓殖

马铃薯原产南美洲安第斯山区,明代传入中国。关于其传入云南的具体时间,学界仍有争议。云南师范大学祝菊澧等通过细胞质遗传分析,揭示了三条主要传入路径:1615年后经印度—缅甸通道传入滇西;1788年后经四川凉山传入楚雄;1843年左右经贵州进入昭通。

云南省境内有马铃薯种植的最早记载,是1848年《植物名实图考》(卷六 蔬菜)中的“阳芋”,此书除记载有种植地域、性状和田间管理技术外,还附有中国第一幅马铃薯植物绘图。清代云南地方志中记载有洋芋的共6本,分别是道光《普洱府志》卷之八(清咸丰六年刻本)、咸丰《南宁县志》卷四、光绪《镇南州志》卷之四、光绪《鹤庆州志》卷之十四、光绪《续修永北直隶厅志》卷之二、宣统《楚雄县志》卷之七和卷之九。从方志地域来看,物产有洋芋的地方,不仅有滇东的曲靖、滇西和滇西北的楚雄、南华、大理鹤庆、丽江,还有滇南的普洱,但也仅此六地。从内容看,除作为地方物产收录外,清宣统《楚雄县志》在职官部分还记有杨毓秀和杨世勋父子教当地百姓种洋芋以足食的事迹。

宣统《楚雄县志》成书于1910年。1909年至1911年,长江中下游地区连续三年发生特大水灾,其中1910年和1911年的灾情尤为惨重,波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洪灾引发的粮食短缺和米价飞涨,直接导致1910年4月长沙的“抢米风潮”。1910年末至1911年,中国东北爆发20世纪最严重的鼠疫之一,东北鼠疫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粮价飞涨进一步加剧了饥荒。1911年4月至5月,天津《大公报》连续五期刊发《动种洋芋说》,作者陆安提出“荒田种洋芋”可以救荒御灾,且“费少益多”,而且洋芋“为易种之品”“不似米谷之难于培植”。云南

在《大公报》提倡推广种植洋芋之前,就已经有教当地百姓种洋芋的实践,尽显远见与仁心。

因马铃薯的适应性强,且便于贮藏,既可作蔬菜,又可代粮食,以及救荒和抗战的战略需求,民国时期云南马铃薯种植地域进一步扩展,产量也有较大提升。1924年的《昭通县志》记载的昭通洋芋有白洋芋、红洋芋、脚根芋等品种,这些品种也是云南当时普遍种植类型。《续云南通志长编》载1935年云南省建设厅统计的全省马铃薯种植面积174.9万亩,出产鲜薯1066.2万担。1940年出版的《云南省经济问题》刊载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云南省主要农产品产量调查表,记载了省建设厅不完全调查情况下,马铃薯当时在云南的出产地有101个县局(局即设治局),产地数次于玉米、稻米和豌豆,产量则仅次于稻米和玉米。1942年出版的张肖撰写的《云南经济》里记载有作者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调研了昆明、马龙、曲靖、沾益、宣威和开远等地的主要粮食产量和价格,除开远外,其他各地均有马铃薯,且产量较高的马铃薯,尤其是马龙和曲靖,马铃薯产量超过了稻米,成为最大宗的粮食作物,但价格也最低廉。

乡土主食,民生根据:马铃薯在云南的主粮化转型

1955年,我国《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提出“增加稻米、玉米、薯类等高产作物的播种面积”,并要求“薯类像红薯、土豆等则比一般杂粮的产量要多5.6倍”。在食品工业方面,也提出要“逐渐地利用薯类和果类等代替稻、麦、杂粮粮食,以节约粮食”。这些举措对缓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粮食、饲料的紧张情况,应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快速增长的人口压力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马铃薯在云南的主粮化

转型提供了政策指导。

在云南,从滇东北到滇西、滇南,马铃薯历史上长期是农户日常口粮与应急储备,适宜山地耕作,耐贫瘠、稳产性强,既是“温饱薯”,也是“救命粮”。这种根植乡土的食用传统与生产韧性,使其主粮化转型与云南农业实际高度契合。

据1996年版《云南省志·农业志》记载,从1952年到1985年,云南薯类作物播种面积从179万亩增长到346万亩,亩产从仅105公斤增加到182公斤。其中,宣威是当时的马铃薯种植大县,1985年产量达9.45万吨,约占全省马铃薯总产量的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马铃薯、甘薯、木薯等作物没有细分,一直按“薯类作物”进行大类统计,直到1982年马铃薯才开始单独统计。由此也可窥见马铃薯在农作物中地位的攀升。据《云南省志(1978—2005)·农业志》记载云南省马铃薯播种面积在1995年攀升至420万亩,2005年的种植面积,则再次攀升至525万亩。

2008年,我国出台了《全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年)》,马铃薯是16个规划中“关系国计民生、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对农民增收带动作用明显的优势农产品”之一。该规划着力建设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南方5个优势区。云南则是西南马铃薯产量第一大省,规划为云南马铃薯主粮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基础。2015年,中国正式提出马铃薯“主粮化”战略,将其定位为继水稻、小麦、玉米之后的第四大主粮作物;2016年,《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明确将马铃薯作为主粮作物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开发。云南省也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开启了马铃薯主粮化转型战略。2017年,云南省马铃薯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近1/10,且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前列,其中曲靖、昭通、昆明三市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合计占全省的

75%以上。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在《关于做好2021年粮食稳产增产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马铃薯种植面积要扩大到900万亩以上”,并推动构建“四带”协调发展格局,打造周年生产基地和商品薯供应基地。

科技赋能与政策协同是云南马铃薯主粮化转型的关键特征。经过云南本土科研人员的长期努力,2023年,“云薯108”入选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成长型品种);2024年,“云薯505”入选农业农村部农业主导品种;2020年和2023年的“滇薯23”、2024年的“云薯108”分别入选云南省农业主导品种;2025年,“云薯505”和“滇薯23”入选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2021年,昭通市巧家县“云薯108”品种实测亩产达6479.75千克(约6.48吨),刷新了西南地区最高单产纪录,这充分体现了云南在马铃薯高产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也凸显了科技赋能云南马铃薯主粮化的成效。2024年,中国第一条“土豆米”生产线在昭通市巧家县建成投产。“土豆米”,是一种将鲜土豆转化成米粒状淀粉制品的新型加工技术,有望让产量巨大的土豆成为更多中国人的主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云南马铃薯的主粮化转型最终落脚民生福祉与乡村振兴。脱胎换骨的马铃薯产业正带动云岭大地薯农稳定增收,拓宽就业渠道,加工增值提升产业效益,助力山区集体经济壮大。从餐桌主食到产业支柱,马铃薯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又激活山地农业潜力,成为云南稳民生、兴乡村、保安全的重要支撑,书写乡土主食赋能民生发展的新篇章。

【作者分别系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本文系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乡村文明建设推进西部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5-pp-12)的阶段性成果】

云南文史

三国至唐宋时期的云南族群交融

陈曦

三国至隋唐时期,中央王朝“因俗而治”的羁縻怀柔政策在云南得到了广泛推行,诸葛亮七擒孟获故事的广泛流传,反映出这一政策在云南已深入人心。南中大姓推动的夷汉融合,成为中华文明南北时期民族大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南诏、大理统治者借鉴中原政权的羁縻制度,有效地促进了云南各民族的交流融合。

宽严相济 因俗而治

随着秦汉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内地居民陆续迁入,与本土民族不断交流融合。三国至隋唐时期,中原政权对云南各部落普遍采取了羁縻怀柔政策。当时南中大姓往往结交夷帅,亦即少数民族首领,引为援手,二者已开始了夷、汉合流。《华阳国志·南中志》就提到大姓与夷帅打亲家、拜把子,恩同骨肉。而大姓也往往熟悉少数民族文化。比如建宁郡孟获“为夷、汉所服”,号召南中夷、叟反蜀时,能够娴熟引用少数民族生动活泼、富于比喻手法的格言“夷经”,汉文记载说孟获是汉族大姓的后裔,而少数民族传说和记述中又说孟获是少数民族的祖先。世代生活在南中的孟获,称之为夷化的汉人或汉化的夷人均可。因为他的夷化,所以他能号召南中夷、叟反蜀,也因为他的汉化,他又能在失败后向蜀汉的政权去做大官。这种复杂的状况,显然是由于多民族云南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降服孟获,留下一段嘉话。《华阳国志·南中志》《汉晋春秋》均载“七擒七纵”之事;诸葛亮挥兵南征,闻孟获为夷汉所服,欲生擒之。孟获被俘后,诸葛亮以御军阵势,问其感受。孟获答曰:“先不知虚实,故而败绩,若知如此,定能取胜。诸葛亮亮念及北伐在即,南中虽定,恐其心未附,遂笑而释之,令其重整旗鼓再战。如此擒纵数回,孟获心服,归附蜀汉,官至御史中丞。南中夷汉亦渐归心。彼时夷人有口传“夷经”而无文字,诸葛亮特为绘制图谱,以行教化。他保留原有部落组织,留任酋长,普抚各族,重用大姓,淡化了民族矛盾,促成了南中内部的交融。

孟氏统治云南时期,各宗支开枝散叶,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部落。与此同时,孟氏与当地土著的联系也愈发紧密,逐步“夷化”,加强了云南境内的民族融合。孟氏部落属西蜀、东蜀的分别,东蜀在今的昭通、曲靖、贵州一带,以乌蛮为主的各部族受汉文化影响较小,孟氏多与之联合,但不能直接控制。孟氏对西蜀部落的控制较为深入,居住于今日昆明、曲靖、楚雄、红河、文山地区的白蛮部落,社会发展程度较高,有城、文字、历法,受汉文化影响较深。隋朝为降服孟氏势力,多次在云南用兵。但是云南境内部落林立,本身没有形成紧密的政权实体,一时的军事胜利也不足以掌控云南全境。

唐朝对云南推行怀柔羁縻之策,在边远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与内地州县迥然有别。其长官由部落首领充任,受唐廷册封,定期朝贡,接受上级机构节制,职位世袭。行政财政上,羁縻府州依本部落风俗治理,户籍多不上报户部,赋税远轻于内地,唯服从征调,戍守边疆。唐朝以此间接统御云南,既节约治理成本,亦利于民族关系稳定。唐朝先后倚仗孟氏、南诏经营云南,任命孟达为昆州刺史、南诏都督,册封皮逻阁、异牟寻为云南王。安宁王仁求墓碑亦记述其出身西蜀酋长,任河东刺史时效忠唐朝、平定洱海叛乱之事,足见唐初羁縻制度的运行规则。

迁徙征调 促进交往

南诏兴起后控制了广阔的疆域,南诏统治者借鉴唐朝羁縻政策,对治下的民族实行了迁移、征调,客观上促进了云南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南诏与中原地区的冲突,也使一部分汉族融入云南各族当中。南诏治下的云南,各民族习俗、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南诏在洱海直辖区、节度和都督之外,对东蜀、牂牁、东

蛮诸部实行羁縻统治。阁罗凤吞并爨部后,在滇池地区筑拓东城(今昆明)、设置通海都督(今通海),又将20万户西爨白蛮迁往永昌城(今保山地区),爨部的统治基础被连根拔起,只剩当地白蛮因散居林谷,未被强行迁徙。公元794年,南诏重新归附唐朝,完成对云南的统一。南诏对原先依附吐蕃的三浪江、磨些蛮等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迁移,涉及东部爨区、洱海地区及永昌地区。除了整体性的迁徙,还有不少南诏统治下的民族被零星征调参与各项军事行动,离开其世居地。南诏的民族迁徙政策加速了云南民族融合的进程,可以说“南诏时期是自秦汉王朝开拓西南以来的又一个民族融合时期”。

隋唐之间,汉族移民除了定居于滇东地区,与爨部白蛮相融合外,在洱海流域也建立了城郭村邑,经过与当地彝民长期交融,形成了名叫白子国的松散酋邦。唐初白子国被南诏征服,大大增强了南诏的实力。唐代曾设姚州都督府,汉族戍卒、流民进入此地,南诏与唐朝爆发冲突后,大批中原远征军流落云南。今天的大理苍山斜阳峰还有将军庙,祭祀征伐南诏身死的唐朝大将李宓,正是李宓部将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中的一个缩影。此后南诏侵扰南诏、西川,也俘获了大量人口,除了著名的西泸令郑回,还有大批能工巧匠、普通百姓。

族群盟誓 务求长久

南诏末期,民族矛盾激化,段思平在建立大理政权的过程中注重民族团结,建政后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羁縻制度,改变南诏强制迁徙与武力征讨为主的策略,缓和了与西南境内的民族矛盾。段思平出身于白蛮贵族,不仅起兵反抗义宁杨氏政权时,还笼络了白蛮贵族董氏、高氏,还得到其舅父巴甸(今建水)乌蛮首领董判的大力支持。云南东部白蛮经过发展,到南诏末期出现了乌蛮三十七部,段思平任通海节度使期间,积极与东部乌蛮三十七部联络,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免其徭役,并在善长、普抚各族,重用大姓,淡化了民族矛盾,促成了南中内部的交融。

大理国建立后,段思平兑现诺言,免除了境内包括东部乌蛮三十七部在内的各族群体的集体赋税地位,这些民族群体也由此成为段氏政权的拥护者。段思平延续了白族内部的封建分封制,在南诏行政区划的基础上设置八府、四郡(镇)、三十七部为地方基层行政单位。在云南其他被统治少数民族内部,分别保持着与白族不同的地方政治、经济结构,白族封建主要通过各族内部的贵族分子来进行贡纳的征收,这种方法,恰与中央王朝统一时期对云南民族地区施行的羁縻政策一样。

大理国通过盟誓或分封的形式,给予辖区边地边疆各民族一定程度的自治。除了段思平时期的会盟,公元971年,大理国三军都统段正严率部会盟于平定叛乱,回军至石城,也与三十七部歃血会盟,约定“务存久长”。这次盟誓的碑刻还保留到了今天,成为云南民族团结的历史印记。大理国对景范金殿国也采取同样的政策。公元1180年,金齿百夷首领叭真在景范(今西双版纳景洪)建立景范金殿国。景范金殿国控制了兰那(在今泰国北部)、猛交(在今缅甸东北部)、猛老(在今老挝北部)等地的金齿百夷部落,成为一个地域广大的地方政权。大理国王赏赐叭真虎头金印,与景范金殿国建立宗藩从属的关系。

大理国亦沿用南诏做法,移民充实待开发的地区。大理高氏专权时,徙今祥云一带的些莫徙蛮200户于楚雄(今楚雄)黄蓬井。又迁汉人于和曲州(治今武定县南)、徙赵、张、王、李等十二姓(白蛮)于会川府(治今四川会理)所属的古会川。但规模上远不及南诏时期,对社会生产的干扰也较少。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

怒江各民族抗战记忆中的家国认同与疆域守护

苗丽 张根生



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东南亚国家的侵略战争。为控制东南亚,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缅甸成为日本进攻的重要目标。次年5月,缅甸沦陷,滇西的畹町、芒市、怒江等地随即沦为中日战争的前哨。日军进犯怒江期间,给各族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危难之际,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各族群众与中国军队团结协作、共御外侮,为捍卫国家疆域完整与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怒江州各民族、各阶层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的贡献

怒江州境内各民族早已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为保家卫国、捍卫民族尊严,满怀爱国热忱的各民族,各阶层积极投身于反抗外来侵略的革命斗争。

一是设治局。抗战时期,怒江境内设有泸水、碧江、福贡、贡山四个设治局。客观而言,设治局的治边举措对民族发展不乏积极影响,但在国家危亡之际,其对外侵略的态度与国家、人民保持一致,各司其职守,积极支援抗战。在中国远征军、华侨难民经怒江回国之际,六库老土司段浩沿途设立多处“临时难民接待站”,组织募捐、筹集钱粮,救助远

征军与华侨难民。为防止日军渡江,六库、鲁掌、大练地等土司组织成立福鲁泸训练民众自卫支队,开展抗日宣传,运送边防部队与难民渡江,为江防部队输送粮秣、传递情报、侦察敌情。

三是各族群众。中国军民在怒江合力抗击日军的斗争具有鲜明的全民性。各族群众以多种方式将满腔爱国热情化为实际行动,身处后方的各族群众通过宣传抗日救亡、号召青年参军、修路备粮等投身抗日洪流。据统计,抗战期间仅怒江州老窝各族人民就支援粮草500余石、军米10余万斤、马料10余万斤、马草10余万斤、骡马5匹、肥猪400余头。

怒江州各民族团结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动因

其一,现实因素:保卫共有家园的共同利益诉求。马克思指出,“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抗战时期,各族群众共同生活的家园承载着他们的根本利益。日军人侵致使各族群众流离失所,严重威胁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正是基于驱逐外敌、保家卫国的共同利益诉求,面对外来侵略,各族群众进一步增强了团结协作、共抗外敌的共识。

其二,历史因素:“大一统”理念的国家认同。历代中央王朝在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通过治边举措逐步将怒江地区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大一统”政治理念在怒江地区的具体实践,不仅密切了中央与怒江地区的联系,巩固了国家统一,而且对各民族国家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塑造作用。

其三,情感因素:维护祖国统一的坚

定信念。外敌人侵强化了各民族的国家观与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近代以来,英、法、美、日等国曾以武力侵占、文化渗透等方式侵扰怒江,正是在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过程中,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信念不断凝聚增强。

总之,各民族在参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及其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信念,具有重要的凝聚与社会动员功能,对各民族的行为选择发挥着深层的价值导向作用。

怒江州各民族团结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意义

维护了国家疆域完整与统一。疆域关乎国家资源储备、国际竞争能力与地缘政治格局,亦限定了国家权力的作用范围与对象。疆域与国家密不可分,国家统一必须以疆域完整为前提。日军人侵滇西期间,大举进犯怒江,妄图侵占中国领土。1942年9月,独立营营长谢晋生率部对驻片马日军发起攻势,历经一年余艰苦抗战,终将敌军驱逐出境,成功收复片马。1944年5月,泸水战区右翼兵团54军3个团在群众协助下强渡怒江,于观音寺、岩头上、小横沟、灰坡等地与敌军激战,全歼上江境内之敌。在中国军民的团结协作下,日本侵略军被逐出国门,有力维护了国家疆域的完整与统一。

强化了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怒江各民族抗日斗争深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日军进犯滇西期间,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在滇西战事告急之际发表《告滇西

父老书》,呼吁“尤其我们滇西的广大民众……服从军政长官的指示,推进军民合作的工作,戮力同心,协助作战”。各族民众深受鼓舞,纷纷表达了誓死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六库、鲁掌、卯照等五土司在致李根源电文中写道:“倭寇侵略中国……职等或衔膺重命,或世守边疆,保乡保国,责无旁贷,誓以奖率绅民共抗敌寇。”正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怒江各族群众取得了对外作战的伟大胜利。也正是在共同抵御外侮的过程中,各族群众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凝聚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发展的引领力量与组织保障。

深化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深刻阐明了交往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彼此的交往交流交融。怒江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是各民族在政治生活领域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体现。这一历史实践,不仅促进了各民族的情感交融,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而且强化了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情感认知,深化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质内涵。

怒江各民族团结奋发的历史实践昭示:民族团结、人心凝聚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要保证。当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引导各民族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不断推进中华民族成为凝聚力更强、包容性更广的共同体。

【作者分别系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后、云南中医药大学教授,云南中医药大学副教授】